

论 80 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 泛滥同新保守主义的关联

王希亮

内容提要 80 年代以来,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日本的国家战略开始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新保守主义思潮逐渐泛滥,修宪、改史、扩充军备的声浪和行动逐日与增。于是,战后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清算的旧军国主义史观在这种适宜的土壤上开始泛滥起来,从官方到民间,从学术界到社会团体,右倾战争翻案的歪风越刮越凶。本文从新保守主义的产生切入,揭示新保守主义对右倾战争翻案活动的影响和催进,分析其表现,进而从日本社会的现实政治走向透视旧军国主义史观泛滥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日本 新保守主义 右倾战争翻案

80 年代以来,日本朝野上下为侵略战争翻案以及抵毁东京审判、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论和活动层出不穷。笔者以为,除去历史的远因之外,80 年代以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表现在执政党从保守主义向新保守主义转型的国家战略方针上,则是造成日本军国主义史观复活、泛滥和猖獗的主观近因。本文拟就日本新保守主义对右翼翻案活动的影响及关联进行分析,以求教于海内外同仁。

战后以来,特别是自民党的“五五体制”确立以来,日本国内的保守阵营实现了大联合,由自民党执政的核心指导体系进入一个较长期稳定的阶段,并开始推行一条保守主义路线。这条路线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支柱,对外无条件追随美国,对内维护宪法第9条的和平主义,展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到70年代末,经过经济复兴和高速成长两个发展时期,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在这个时期,不能说日本的战争翻案活动没有涌动,因为执政的自民党首魁多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有些人就是当年的战犯(如岸信介),他们也时不时地追随冷战气候,发表一些否定侵略和反华反共言论,甚至为战死者授勋,私人参拜靖国神社等。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执政党经济主义政治的定位,日本朝野上下都朝着“国民所得倍增”的目标迈进,客观上使旧的军国主义史观缺乏适宜的土壤,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及活动也未形成大的气候。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日本国内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国民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自民党的腐败“金权政治”的暴露(田中角荣内阁的洛克希德事件等),自民党统治已呈现危机端倪。

1978年12月,大平正芳组阁。大平政权认为,随着日本经济

五五体制:1955年,日本两个最大的保守党,即自由党与民主党联合,组成自由民主党,标志着日本保守势力的大联合,以此为基础,日本开始了自民党长期独霸政权的“一党独大”体制,称之五五体制。直到1993年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五五体制崩溃。

大国化的实现,以及日本社会的全面转型,日本的国家目标也应该从“经济中心时代”转向“重视文化时代”,尤其是“必须积极地发挥和负起符合日本国际地位的作用及责任”。1979年1月25日,大平正芳在组阁后的施政演说中说:“战后30余年,我国为了求得经济的发展,一往无前地迈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今后)根据我国对世界的作用和责任,必须认真地展开内外施策……为此,必须坚持有节度的自卫能力以及‘日美安保条约’所形成的安全保障体制,同时,为开创和平的国际环境,展开积极的外交努力也是不可缺少的。”此后,大平正芳又多次在国会会议上指出,日本“必须分担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和作用”,“为了维持基本的国际秩序,我国应该负起符合其国际地位的责任,发挥其作用”,“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轴,努力整备自卫所必需的、有限度的而且是高质量的防卫能力,确立与我国相称的防卫体制方针”。可见,从大平政权开始,强调“国际贡献”,走政治大国之路的新保守主义已露出萌芽。也可以说,这是自民党政权迈向新保守主义的第一步。

到了1982年,经过铃木善幸的过渡内阁,战时曾任皇家海军人需官的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从此,新保守主义正式登场,并成为后来的自民党政权的施政指导方针,标志着日本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开始从经济现代化向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化转化,即向政治大国化和军事大国化迈进。中曾根上任伊始,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在政治主张上,他要“总决算”的目标之一就是战后以来保守主义的“经济主义政治”;主张向“国际国家的日本迈

〔日〕吉田茂:《激动の政治百年史》,日本国会年鉴编纂会1992年版,第438-439页。

〔日〕吉田茂:《激动の政治百年史》,第447、453-455页。

进”。其具体的战略构想和政策主张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确立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大国地位。中曾根多次强调，日本正处在“重大的转换期”，日本应该“为人类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在国际社会上享有名誉的地位”，“之所以提倡建设国际国家日本，是考虑到我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寄予我国的期待和要求也将增大”。1983年，中曾根在群馬县的一次讲演中，更明确的第一次用“政治大国”的概念取代“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他说：“要在世界政治上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

二是加强日本的防卫力量，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1983年1月，中曾根在访问美国时公开宣称，日本应该力求“全部与完全掌握控制日本海战略海峡，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不使苏联潜艇通过，并不会有其他海军活动”；日本应该成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三是突破防卫开支不得超过GNP1%的禁区。为此，中曾根特意成立一个“和平问题研究委员会”，于1984年12月向内阁提出，“百分之一的防务开支限额久已失去效用”。结果，1986年12月，中曾根内阁通过的1987年度防卫开支数额，突破了GNP1%的限界，达到1.04%。从此，日本连年的防卫开支都突破了吉田茂内阁以来不超过1%的限制，其绝对额甚至跃居世界第2位。

〔日〕吉田茂：《激动的政治百年史》，第487页。

〔日〕吉田茂：《激动的政治百年史》，第479、483、490页。

转引自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美〕倍利（K. B. Pyle）：《日本的问题》（中译本），台湾金禾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同上书，第113页。

四是主张改宪。早在 50 年代初, 中曾根就曾上书麦克阿瑟, “抱怨美国将美国式宪法加诸日本头上所产生的束缚”。后来, 他多次公开反对“外来的宪法”, 声称“宪法草拟的过程, 是由盟总强制的……它包涵现在不切实的成分”。中曾根组阁后, 更明确地表示: “把日本的国防交给另一个国家去执行……直到现在, 我还是禁不住怀疑。”

五是关于战争观问题。中曾根出任首相后, 曾经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是, 他的承认不过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的舆论, 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他在一次讲演时说过: “批评日本战前的差误和缺点, 有些人认为是进步, 但是我坚决反对这种观念, 一个国家, 不论其战胜或战败, 仍然是一个国家。”1985 年 8 月 15 日, 中曾根竟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 成为战后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位首相, 更充分反映了他的真实的战争观。

六是开展教育改革。1984 年 2 月 6 日, 中曾根在国会会议上提出“教育改革的视点”, 要求“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的多样化、弹性化, 并要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追求适应国际国家日本国民的教育国际化”。实际上, 中曾根主张的教育改革, 着眼于“转变国民意识”, “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 “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 同时, 这种自信“必须从理解传统体制和

[新加坡]李炯才:《日本:神话与现实》,海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9- 230 页。

[美]Meirion, Susie Harries:《藏剑入鞘记——日本之非军事化》(中译本),台湾金禾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2 页。

[美]倍利:《日本的问题》,第 94- 95 页。

前引《藏剑入鞘记——日本之非军事化》,第 318- 319 页。

[日]吉田茂:《激动的政治百年史》,第 488 页。

历史开始”。不难看出,中曾根的教育改革完全落点在塑造新国家主义之上,“是复古的国家主义思潮换上新装,以国际化的名义把教育定位在国家主义教育上”。

综上所述,从大平内阁开始,特别是80年代中曾根三次组阁以来,自民党传统的保守主义路线逐渐被修正,以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为目标的新保守主义出台,它刺激了战后以来对侵略战争一直不认帐、不反省、不谢罪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复活军国主义史观提供了国内政治的氛围,并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注意力引导到“增强国民意识”,“反对自虐史观”;大搞战争翻案上来。换言之,正是由于执政党政治路线的转型,一个以否定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为中心的右倾翻案逆流在日本朝野上下掀起。

首先,就在中曾根内阁鼓吹教育改革的同时,出现了1982年文部省检定教科书事件,暴露了“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态度”,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和中、韩等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同年,家永三郎的第二次教科书诉讼案被东京高等法院驳回、败诉。

日本阁议还在这一年把8月15日定为“追悼战死者、祈念和平日”,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日本官方追悼战争亡灵成为定例。

1984年6月,曾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抛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首开日本右翼否认战争罪行之先河。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成为战

(美)倍利:《日本的问题》,第105、107、108页。

(日)今野日出晴:《“近现代史”授业改革の射程》,载《人民の历史学》,第128号,东京历史科学研究会1996年版。

(日)三浦永光:《战争牺牲者と日本の战争责任》,明石书店1995年版,第31页。

后以总理大臣名义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人。并为自己的举动辩解：“国民应该感谢为国家而倒下的人们，不然，谁还为国家献出生命呢！”甚至称“为了亚洲在第一线战死的官兵们是英灵”，“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东洋和平，二百数十万纯真的英灵而战死”。

由于中曾根的“言传身教”，他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也充当了“失言大臣”的第一人。声称“日韩合并韩国也有责任”，南京事件是“为了排除抵抗”，“战后日本教育是毁灭日本的教育”等等。

紧接着，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公然表示：“我不认为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接任中曾根组阁的竹下登也说，“是否是侵略战争，应该是后世历史学者评价的问题”。

这样，从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在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作用下，战争翻案逆流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并把这个高潮推向 90 年代。

二

进入 90 年代，随着冷战结束，海湾战争爆发，地区冲突的加剧，世界格局出现单极化趋势。在日本国内，由于“金权政治”丑闻层出不穷，引起自民党执政史上的大地震，日本政坛进入派系林立，多党争雄的“热闹”时期。然而，无论是自民党的主流派，还是分化出去的“改革派”，都几乎忠实地继承了中曾根内阁的新保守主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打着“国际贡献”的旗号，反对“一国和平主义”，鼓吹自卫队走出国门。1991 年，不待国会批准，日本防卫厅就派出自卫队

〔日〕田中伸尚：《遗族と战后》，岩波书店 1995 年版，第 170 页。

〔日〕三浦永光：《战争牺牲者と日本の战争责任》，第 113 页。

170余艘扫雷艇驶进波斯湾,公然违反了“不准海外派兵”的宪法制约。接着,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PKO法案”,日本军人(自卫队)的身影战后首次在列岛之外的柬埔寨、卢旺达、莫桑比克等地出现。

二是改宪的声调此起彼伏。曾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多次声称,“宪法第9条是理想主义的产物,是不合当今之形势的”。竹下登内阁的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更是一个狂热的修宪派,早从80年代末就喊出“不”字,认为“不能拥有军队的宪法第9条”是“美国人给日本人安上的‘令人不舒服的假牙’”。1999年,身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赤裸裸抛出“宪法破弃论”。最近,他又说,“法律是可怕的……宪法这个基本法,在下意识上具有国民拘束力,其结果使日本人彻底学会了依赖外援的思考方法”。

三是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新保守主义迈向政治大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早从竹下登内阁始,就开始强调“在政治上大胆地构想和实施”,“确立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姿态”,特别是“要从世界的观点进行国际性贡献,增大我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域的重要性”。海部俊树上台后也称,“作为国际社会重大存在的我国,是有责任的国家,必须明确今后前进的方向……主体上要对国际和平作出贡献”。同时,明确提出了跻身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为了实

PKO法案:1992年6月,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即PKO法案,公然违反宪法中自卫队“专守防卫”的原则,战后第一次派出自卫队去海外,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对和不安。

〔日〕浅井基文:《日本新保守主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日〕石原慎太郎、福田和也:《座して待つが大暴落》,载《诸君》2000年第3期,文艺春秋社。

〔日〕吉田茂:《激動の政治百年史》,第508、513、514页。

〔日〕吉田茂:《激動の政治百年史》,第542页。

现这一目标,日本不惜“出血”,成为联合国的出资大国;施展“日元外交”,连续当选“非常任理事国”,获得“准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推荐日籍官员担当联合国高级职务,加大日本的发言权;选派外务省官员四出游说,拉拢选票,展开全方位外交等等,摆出了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

四是继续发展军备。自 1987 年日本的防卫开支突破 GNP 的 1% 大关后(31574 亿日元),1990 年度,防卫开支增至 41688 亿日元,突破了 4 万亿大关,为 1987 年的 132%。而且,此后的每年均以高出 3% - 4% 的比率递增。其自卫队人数已超过英国,主战坦克超过英法,海上自卫队舰艇规模超过英国和意大利。

可见,进入 90 年代,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不仅仅停留在酝酿、策划和鼓吹的阶段,而是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迈出了切实的步骤。在“日本重建”、“大国意识”、“军事贡献”、“反自虐史观”、“反一国和平主义”的诱导、蛊惑和推动下,更为军国主义史观泛滥提供了空前适宜的政治社会环境,右翼战争翻案活动愈演愈烈。

(一)“失言大臣”层出不穷,翻案言论更加肆无忌惮。从 90 年代开始,石原慎太郎、柿泽弘治、永野茂门、樱井新、桥本龙太郎、岛村宜伸、渡边美智雄、西村真悟等日本政要先后跳上讲坛,公开发表否认侵略战争和战争罪行的言论,甚至置个人的政治前途于不顾,大有飞蛾扑火、横尸无悔之势。

(二)代表自民党战争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问世。1993 年 8 月,战后连续执政 38 年之久的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细川八党联合内阁成立,向来“一党独大”的自民党一下子落为在野党,其在台上想说而有顾忌的话,此时再也不必遮掩,通通倒了出来,《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最集中的代表。该书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全面肯定“大东亚圣战”,美化天皇法西斯专制,抵毁东京审判,否认战争罪行。是一部汇集日本朝野右翼翻案势力的观点、向东京审

判和历史真实进行“总决算”的翻案宣言书。

(三)《战后五十年决议》闪烁其词,风波迭起。1995年,在迎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包括日本大多数国民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历史问题有个明确认识,划个圆满的句号奔向新的世纪。1995年6月9日,在执政党之一的社会党的斡旋下,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之决议》被国会勉强通过,这份《决议》除了对“过去的行为”表示“反省之念”外,回避了战争责任及战后赔偿等问题,还把“英美同罪论”塞进决议里。就是这样一份极其暧昧的决议也遭到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由212名自民党国会议员(自民党国会议员总数296人)组成的“终战五十年国会议员联盟”,明确表示反对该决议,声称要“纠正单方面对我国断罪和自虐的历史认识”。从自民党分化出来的新进党也成立一个“联盟”,发表“趣意书”称,“谢罪是践踏了先人们的努力和名誉,也使我们肩负残暴无道民族的标签永劫不得解脱”。

(四)“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其他右翼学术团体的活跃。1995年7月,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发起组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下简称“自研会”),宣扬以“自由主义史观”来研究日本近现代史,认为战后以来日本的历史教学始终被“反日史观”和“自虐史观”所统治,主张打破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三个史观的束缚,即“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自研会”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坚持“慰安妇商业说”、“生化武器未用于实战说”等等。从1995年开始,“自研会”及藤冈相继

[日]波田永实:《“战争责任否定派”の动向と论理》,载《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第11号(1996年春季号),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编,1996年3月15日。

[日]波田永实:《“战争责任否定派”の动向と论理》。

出版了《教科书中没有讲授的历史》《污蔑的近现代史》《历史教科书中的十五年战争》《历史之本音》等著述,广为发行,影响极坏。

除“自研会”外,还有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为代表的“昭和史研究所”。中村的代表作是《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展转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在这部书中,中村氏全面肯定“大陆政策”,极力美化“大东亚战争”,胡说“满洲并非中国领土”,“二十一条并不过分”,甚至把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栽脏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编写新历史教科书会”。1996 年 12 月由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组建,声称拥有会员 5000 余人,其宗旨是推翻战后以来日本史学界的一切研究成果,鼓吹重新改写日本的历史教科书。1997 年 7 月,《新的日本历史的开始》(幻冬社)一书问世,在这部书中,凡是历史已经定论的事实,国际法庭裁决的问题等都被他们随意颠倒过来。一言以蔽之,该书“新”就“新”在无视历史事实,甚至颠倒黑白,伪造历史。去年,西尾干二又推出大部头的《国民的历史》(扶桑社),从带有特殊意义的远古天皇神话到战后日本,都体现了作者随心所欲篡改历史的“新”观点。

“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1994 年成立,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会长,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佐藤和男为副会长,“日本遗族会”为其中坚力量。为反对《终战五十周年决议》通过,该委员会在全国发起签名运动,计征集到 506 万人签名。在二战结束 50 周年之际,该会召开一次有万人参加的“亚洲共生祭典”;又敦促全国 25 个县级议会作出“追悼和感谢战死者决议”;还拍摄了《亚洲独立之光》《自由亚洲之荣光》等影片到各地巡回演出,公开为侵略战争歌功颂德。该会还出版发行一部《世界裁判东京审判》(国际企画社,1996 年 6 月),攻击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片面断罪”,“蹂躏了国际法”,“审判手续不公正”等,扬言要“掀起批判

东京审判的国际正义”，为战犯“恢复名誉”，“恢复被联合国剥夺的历史解释权”等等。

日本舆论会。1990年成立，原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为名誉会长，柴田正为会长，片冈正己、三轮和雄为副会长，中村粂、佐藤和男、田中正明、小堀桂一郎、名越二荒之助、加濑英明等人为干员。该会把主要攻击矛头对准“只把日本断罪为侵略者、加害者的反日的新闻机构”，尤其是对《朝日新闻》实行“监督”、“纠正”、“斩断其偏向报道”，不时发表文章抨击《朝日新闻》的有关报道。另外，该会的主要成员又是炮制电影《自尊》的头面人物。

日印亲善会。1997年2月成立，上智大学教授渡边升一为理事长，电影《自尊》制作委员会成员如加濑英明、田中正明、名越二荒之助等都是该会理事。该会打着日印亲善的幌子，以“显扬”在东京审判中投反对票的印度法官帕尔为借口，主要目标是攻击东京审判。渡边升一著有《国益的立场》《日本的傲慢、韩国的傲慢》等，1997年8月，又推出一部《新忧国论》（德间书店），俨然以“忧国之士”的面目出现，指责东京审判“本质上是复仇”，“东京审判不属于国际审判，不过是美国占领行政的措置之一”，东京审判依据的是“事后法”，呼吁日本社会各界“清除东京审判史观”，“向东京审判问罪”等等。

除上述团体外，还有“日本历史修正协议会”、“正论之会”、“纠正教科书亲子会”、“保卫兴亚观音会”、“思考NHK报道会”等等，都是以“研究学术”为名，行战争翻案之实的右翼学术团体。

除文中提及的人物外，小堀桂一郎是东大名誉教授，曾主编《东京审判驳回、未提出的律师资料》；名越二荒之助是战争参与者，曾在中国战场作战。

三

1996 年 1 月, 桥本龙太郎上台组阁, 自民党又回到日本政治权力的中心, 到小渊内阁的“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政权, 尽管自民党的政治权威不再是“一党独大”, 支配一切, 却也是比较牢靠地主导和操纵着日本的政治方向, 继续朝着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迈进, 而且, 步子迈得越来越大, 向右滑得越来越远。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1985 年, 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之后, 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 碍于国内外的反对呼声, 他的后任都顿住了迈向靖国神社的脚步。然而, 桥本上任伊始不过半年, 就打破了这种“沉寂”, 于 1996 年 7 月 29 日堂而皇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 以日本神道的仪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无异于为国内的右翼势力鼓劲打气, 进一步激发了国内的战争翻案狂潮。有右翼学者立即著文呼吁, 要求国会把 8 月 15 日定为日本的“卧薪尝胆纪念日”。1996 年 8 月 15 日这天, 除了桥本内阁的许多要员登神社参拜外, 一批老“皇军”还身着军装, 肩扛大枪, 打着军旗在靖国神社门前“耀武扬威”, 气焰十分嚣张。

(二) “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出台。1996 年 4 月, 克林顿访日, 与桥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决定修改日美安全合作的指导方针, 将“日本有事”扩展到“日本周边有事”, 将“保障日本本土安全”扩展到对付亚太地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1997 年 9 月 23 日, “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出台, 1999 年, “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改正案”及“物品役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 改定案) 等相关法案也相继出台。“新指针”及相关法案明显违反了宪法第 9 条的原则, 置宪法于空洞化; 又突破了自卫队

“专守防卫”的约束,自卫队可以凭借这些法律走出国门,开展所谓的“后方地域支援”、“后方地域搜索救助”、“船舶检查”等三大军事任务,并且,准许自卫队“有限度的使用武器”。更严重的是,“周边事态法”已明确把台湾海峡划入其“防卫”范围。尽管,该法以暧昧语言声称“周边事态法”并非地理概念,但是,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的诘问下,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台湾海峡是否属于其“防卫”地域。鹰派人物小泽一郎则公开叫嚣,“日美防卫指针的地理范围不仅包括台湾、朝鲜半岛,还包括中国大陆及俄罗斯”。自民党众议院防卫合作指针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山崎拓也称,“周边事态法”适用于台湾海峡。此外,依据这些法案,一旦“周边有事”,日本政府有权要求全国上下“予以必要的协力”,战时国家总动员体制就会重演,日本也将彻底沦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舆论界曾有评论,认为“新指针”及相关法案是一部“战争法”。

(三)“国歌、国旗法”出台。1999年8月13日,日本国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国歌、国旗法”,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和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众所周知,“君之代”与“日之丸”是战争时期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的日本国歌和国旗。“君之代”是颂扬天皇的统治千秋万代,永世不息。而“日之丸”旗更同侵略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由136名各界人士联合发表的一份抗议书中指出,“‘日之丸’与‘君之代’是以天皇制为中心的近代日本国家在统治国民的过程中,作为发扬国威的象征装置起到了中心作用……在国外,它是合并异族以及侵略东亚近邻诸国和地域的道具”。日本之所

〔日〕新力“イト”ラインを考え会编:《周边事态法Q&A》,岩波书店,1999年4月20日,附录部分。

〔日〕《中文导报》1999年4月15日,第18版。

〔日〕《产经新闻》1999年6月24日。

《“日之丸·君の代の法制化”に反対す共同声明》,载《世界》1999年8月号。

以在战后 54 年把象征专制、侵略和霸道的“日之丸”及“君之代”法制化,其“日本再建”的新国家主义意图暴露无遗。

(四)修改宪法摆上了日程。早在 1993 年 1 月 27 日,小渊惠三就在一次讲演中主张改宪,他说:“我过去一直感到有必要修改宪法,宪法制定的过程,其中的条文以及字句等,并非不存在问题。”1995 年 5 月,他再次提出为实现修宪而实行“保保联合”体制,以便加大削弱国会的反对派势力。果然,在他上台组阁后,就实现了“自自公”的“保保联合”。接着,在 1999 年一年之内,促成几项完全违反宪法原则的法案通过。有学者评论称,“1999 年是日本‘地壳变动’的一年”。2000 年 1 月 20 日,日本众参两院正式成立了宪法调查会。战后以来对宪法第 9 条耿耿于怀的政要人士、右翼势力终于亮出了向和平宪法开刀的白刃。参议院宪法调查会会长村上正邦称,“禁忌被打破,在新千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设立宪法调查会,实在令人感慨万千”。可以预料,一旦改宪派占了上峰,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就不遥远了。

从桥本内阁到小渊内阁短短的几年间,日本政治向政治、军事大国化的目标明显地迈出了一大步,随之而来的是旧的军国主义史观泛滥、猖獗,否认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的右翼势力异常活跃。

1998 年 5 月,美化东条英机,歌颂“大东亚圣战”的电影《自尊》出笼;接着,小林义则的漫画集《战争论》登场,且广为发行,影

〔日〕《赤旗》1998 年 8 月 14 日。

保保联合:自桥本内阁开始,自民党又回到日本政治权力的中心,到小渊内阁成立,政权内排除了被称作革新势力的社会党(现改称社会民主党),由自民、自由、公明三个保守党联合执政,时人称之保保联合。

〔澳大利亚〕Gavan mc Cormack:《一九九九年的地壳变动》,载《自自公暴走ストゾブ》,《世界》紧急增刊,岩波书店,1999 年 11 月 1 日。

〔日〕《读卖新闻》2000 年 1 月 21 日。

响恶劣。

1998年3月,原关东军参谋草地贞吾联络中村黎发起募捐运动,要在金泽市建一座“大东亚圣战之大碑”,公然为侵略战争竖碑立传。

1999年3月,日本厚生省拨123亿元巨资建成“昭和馆”,存有记述战争的各类书籍7万余册,却几乎都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货色,是个货真价实的美化侵略战争的设施。

1999年10月,防卫厅政务次官西村真悟公然鼓吹“日本应有自己的核武装”。

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在冠以“国际和平中心”的大阪场所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集会,气焰嚣张地向历史真实挑战。就在大阪集会前不久,勇于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老兵东史郎,又一次遭到东京最高法院的败诉判决。

2000年4月21日,107名国会议员毫无顾忌的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内中有山崎拓及其他要员。

4月25日,新任日本首相森喜朗称:“关于战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日本是否进行了那场侵略战争,应该由大家在历史中作出判断。”

4月29日,一伙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扬言要建立神社。

此期间,日本政要的“失言大臣”更是层出不穷,诸如法务相中村正三,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建设相龟井静香以及山崎拓、小泽一郎、梶山静六、石原慎太郎等都时有“惊人之语”。与此相呼应,“自研会”、“编写新历史教科书会”、“昭和史研究所”等右翼学术团体更加活跃。可以说,一条修宪,改史,走政治、军事大国道路的新保守主义在朝野上下形成了市场,并有继续发展的态势。

从70年代末开始抬头的新保守主义,是日本完成经济现代化之后新的国家战略构想和政策主张,它所主张的政治改革、行政改

革以及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等方略,虽然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新保守主义的“核心目标并非是政治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而是政治大国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军事大国化”。它所强调的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说到底带有新国粹主义的意味,“把肯定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指责为‘自虐’的历史观,把参加战争表露成奉献国家的公共精神,以及美化军国主义的战争论,就是新国粹主义的代表形式”。所以,肯定“大东亚战争”,否认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本身就是新保守主义的内容之一。还应该指出的是,新保守主义与“五五体制”以来的保守主义又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维护战后天皇体制,强调传统的国家主义。只是,保守主义把重心放到经济主义政治之上,旧的军国主义史观一时失去兜售的市场。当着新保守主义把国家战略目标明确瞄准政治大国及军事大国之后,历史观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摆上前台,战后以来根本没有得到清算的旧的军国主义史观也就趁机冒了出来,从这个角度看,80年代以来日本朝野上下战争翻案风潮之所以泛滥、猖獗,是不难解释的。

当然,8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泛滥同冷战前后国际环境以及日美关系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关联,因不在本文探讨之内,故略去。

(作者王希亮,1946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

[日] 牧太郎:《中曾根政权·1806日》(下),行研出版局1988年版,第23页。

[日] 加藤节:《歧路に立つ战后》,载《自公暴走ストップ》,《世界》紧急增刊,1999年11月1日。